

第一章 历史志

洛阳城，雄踞中原，东压江淮，南系洛水，西挟关陇，北临邙山；更有群山环绕，东据虎牢关，南对伊阙，西控函谷关，北通幽燕，人称“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老君山位于河南洛阳栾川县城南 3 公里，是秦岭余脉八百里伏牛山主峰，海拔 2 200 米。清《卢氏县志·山川卷》载：“老君山在城南二百里栾川镇（原属卢氏辖治），东鸦关岭，南要儿关，西帽盔山，北临伊河。高四十里，东见龙门，南望武当，西府熊耳，北视嵩岳。”^①

洛阳老君山原名景室山，后因传说中被后世尊为太上老君的老子曾到此归隐修炼而被唐太宗易名为“老君山”，沿袭至今。老君山历代香火旺盛，被尊为道教圣地、天下名山。道教文化区沿途庙宇历史悠久，山顶老君庙有“南有武当金顶，北有老君铁顶”之说。



老君山峰顶风光俯瞰图（曾宪平摄）

一、老子与老君山

1. 老子其人

关于老子其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三种说法：

其一，“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

^① 转引自：扈耕田，张记编著. 洛阳老君山历史文献辑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226.

也”，并且由孔子“问礼于老子”，可见老子或长于孔子；

其二，“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其三，“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可见，关于老子的真实身份和生活年代，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初期，人们就已众说纷纭，以至于一向治史严谨的太史公也无法加以甄别。而关于老子的寿岁，史学家们也没有给出一个定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通过匪夷所思的长寿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在西汉初期就已颇具神话色彩了。总之，扑朔迷离的身世，使老子成为了一位颇有争议的神秘人物，因此后人可以杜撰其传记，将其神化；而“以其修道而养寿”的记载更与修道成仙联系密切，从而也使老子的身世具备被神化的可能性。

2. 老君的由来

自秦汉以来，老子经历漫长的神化历程，与太上老君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兹总结如下：

先秦时代，老子、庄子的思想流传并产生影响，老子被后世尊为道家创始人。后来的道教推崇道家思想，老子就成为了道教的祖师。

秦汉时代，有黄老道一派，他们崇尚无为，尊黄帝和老子，到东汉桓帝时开始为老子立祠。从此，老子便成了神，与天神享有同等的地位。

魏晋时期，道教始创，老子得到进一步神化。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把老子称为“老君”，并认为老子长着一副不同凡俗的“老君真形”。《神仙传》则神化其来历，说老子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怀之七十二年才生。《魏书·释老志》记寇谦之遇大神，自称“太上老君”。在南北朝时“太上老君”就已成为老子的尊号。在南朝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第四中位为太清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为太清道主，下临万民，为道教中尊神。

唐代又形成了三清的說法。太上老君也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最高神的组成部分。

老子的神化过程，经历了从学派传人到教派祖师，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的过程，这些变化反映了道教发展的特点。

3. 老子与老君山

关于老子其人，历史上尚存有诸多争议；而关于老子的归隐修炼之处，史学界更无盖棺论定之说。虽然如此，“老子归隐老君山”的结论也并非毫无根据，

我们在此列举以下史料,以资一证:

(1) 清《南阳府志·校注》卷一载:“老君山,(内乡)县北三百里,突峽悬崖,隐现云表。世传老子学道于此,药灶、丹炉遗迹俱存。”^①

(2) 清《内乡县志》卷一载:“老君山在县北三百里,突峽悬崖,隐现云表。世传老子修道于此,药灶、丹炉遗迹俱存。”^②

(3) 清《卢氏县志》载:“老子讲经修炼于此(老君山)。有老君殿,石柱铁瓦、丹炉、丹井犹存。明代曾贮藏经八柜,至明末,毁蚀无余,顺治间王调元重修。”^③

(4) 清《卢氏县志·艺文卷·敕建老君山金顶太清观记》载:“老君修炼于景室山,在治东南二百里许,老君仙山是也,盘踞中南之首,太和嵩少为副,绝顶巍峨际天。”^④

二、北魏始建老君庙

清《卢氏县志·碑志》载:“北魏时,为作纪念,在山建有老君庙。”

北魏时,时人在老君山顶建老君庙,铁椽铁瓦;庙内置老君骑铜牛像。

三、唐代、明代老君山的发展

清《卢氏县志·碑志》载:“(老君山)到唐太宗时重修,由大臣尉迟敬德监修。”唐朝皇室以老子李耳为祖,太宗颁御旨修缮老君庙,封“铁顶”老君山为“天下名山”。

初唐统治者如此尊崇道教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道教在唐高祖和唐太宗建立帝业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史书记载,李渊在晋阳起兵时,楼观道士不仅称他为“真君”,为他设醮祈福。来自道教方面的认可对于李唐赢得天下人心无疑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李唐皇室将太上老君李耳尊为祖先,借以提高自己的族望。唐朝初年,魏晋以来的门阀氏族观念影响依然较大。李唐的李姓虽然是北周贵姓,但仍无法与山东士族比肩。道家始祖李耳被后世不断神化,被尊为道教的神仙太上老君。唐朝统治者尊太上老君为祖,可以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族望。

① 转引自:扈耕田,张记编著. 洛阳老君山历史文献辑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212.

② 转引自:扈耕田,张记编著. 洛阳老君山历史文献辑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208.

③ 转引自:扈耕田,张记编著. 洛阳老君山历史文献辑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226.

④ 转引自:扈耕田,张记编著. 洛阳老君山历史文献辑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127.

道教不仅成为李唐王室提高族望的工具,也为唐朝统治者治国安邦做出了巨大贡献。道教既包含有后来为道教所利用和引申的长生久视、全性养身之道,同时也包含有以自然无为为宗旨的治国安民之方;而老子之学更是一种具有高度智慧的政治哲学。唐初鉴于隋末动乱之弊,唐太宗君臣以清静宽简为行政原则,运用老子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思想处理国事。可以说,道教思想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理论支撑。^①此外,李唐扶植道教的政策也赢得了道教徒及信道人士的好感,从而培养了一批拥护李唐王朝的社会力量,有效地维护了唐朝的统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唐太宗统治时期,李唐王朝不仅封道士,而且在各名山大川建道观、修庙宇,洛阳老君山就是其中一处,亦合乎情理。

明朝统治者恢复了唐宋时期的崇道政策,利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这既与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有关,也与明朝统治者自身的宗教信仰有关。自太祖以来,几乎历代明朝皇帝都对道教十分尊崇,其中以明世宗嘉靖皇帝为甚。他在位期间,以奉道为首务,把政治权力与宗教信仰高度结合,重要大臣如严嵩、徐阶均为撰写道教祭文的高手,人称“青词宰相”。

到了嘉靖皇帝之孙万历皇帝以及万历皇帝之孙天启皇帝时,道教依然受到尊崇。洛阳老君山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记录在清《卢氏县志·艺文志》中,兹摘录如下:

“太清观,在老君山。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遣中使发帑金,敕建宫殿。”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皇帝颁赐道经一藏贮于“道德府”。而关于这套经书的去向,同书载“明代曾贮藏经八柜,至明末,毁蚀无余。顺治间王调元重修”。

“明天启三年(1623年)秋,邑处士甯(宁)功明暨门朋志友捐金帛、寿梓,雕刻祖师佑圣真君周陶元帅神像,配享老君烟火。”

四、关于“崇祯太子逃遁老君山”的传说

在栾川县,一直流传着明崇祯太子的传说。根据该传说,太子被李自成所俘后并未遇害,而是在随李自成逃亡的过程中趁乱脱逃,并与王承恩(化名王冲如)等人逃至栾川老君山。此后,太子隐姓埋名,伪装成黄冠道人,在暗中被追随他的遗民尊为皇帝,潜居栾川34年,假装道士,以求自保。暗地里活动,期待

^① 本节参考:陶志平.唐代道教的兴盛及其政治背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有朝一日能够光复明朝。随着清朝统治的确立,复明的希望基本破灭,太子的身体与精神状况与日俱下,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病逝,享年51岁。在复国无望和太子离世的背景下,太子随从王承恩和贾上还随后也在绝望中离世。

这是个凄凉伤感而又曲折动人的历史传说。正是因为这些传说,栾川的地方史超越了冷冰冰的资料与数据,有了故事。由于有故事,历史在当地人心目中变得鲜活生动。不夸张地说,这些故事提升了栾川人的历史意识。

这段历史故事牵涉明清易代史上著名的“太子案”,因此这段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两太子案爆发前;第二阶段,两太子案爆发;第三阶段:两太子案爆发之后。

第一阶段,两太子案爆发前。

明朝崇祯皇帝有七个儿子,明清改朝换代时只有三个儿子存世:太子(朱慈烺,出生于1628年)、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通常合称“太子与二王”。1644年3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京师,崇祯帝、后皆自杀,有太监将太子、二王献于李自成。李自成命令监管于刘宗敏处。何修龄先生认为:“综合诸说及各种记载考察,应该认为,农民军攻克京师后,迅速俘获太子、二王,虽加管束,但无虐待,后挟持东征(征吴三桂)。失败后,农民军离京西走前后,三人设法逃脱,挣出农民军羁绊。”^①

何修龄先生的结论是:“这(指上述引文)是比较可靠的史实,是崇祯太子问题发生发展过程前期、两太子案爆发前的基本历史情节,其他细节不可考。”^②

第二阶段,南北两“太子案”。

清兵入关,李自成败退,从北京退回西安,再从西安退出,经陕西、河南,进入湖北。在此过程中,太子下落不明。这件事是明清改朝换代史上的重要问题。1645年3月在北京、1645年4月在南京连续出现两起震动全国的假太子案,更使得慈烺太子在明亡后的行踪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

何修龄先生将前后太子在这一段的行踪乃至结局归结为如下不同说法:

一、随农民军西走后不知所终说。《明史》称,农民军退出京师,“挟太子、二王西走”,“太子不知所终”。太子逃进外祖父周奎家,周奎将其交给清廷,后被杀。何修龄坚持孟森先生太子为清廷杀害说,所以他怀疑这是为了照应清廷诬真为假,杀害崇祯太子而杜撰出来的。

二、潜藏尼庵说。京师失守,“太子走太监曹化淳宅中”,后被曹的门客骗走遗弃,遇一老宫人导入尼庵躲避,因“闻江南有主,遂欲南往”,去太子的外祖父

^{①②} 何修龄,太子慈烺和北南两太子案——纪念孟森先生诞生140周年、逝世70周年——太子慈烺和北南两太子案——纪念孟森先生诞生140周年、逝世70周年,《中国史研究》,2008(2):127。

周奎家求助旅资时被出卖。

三、据《甲申传信录》太子自述，太子在一家店里潜留五日，又在崇文门外尼庵潜住半月，后转移到某明朝官员家密室。官员陪太子到太子外祖父家时败露。此说可称潜藏密室说，也是潜藏尼庵说别本。

四、也有人说太子虽被农民军所获，农民军东征败绩，太子逃脱，被俘，未暴露身份，又走脱，养于民家。因到外祖父家访妹被出卖。这可谓被掳后养于民家说。

五、还有人说，太子一直由农民军拘管。李自成死后，拘管者将太子献给清廷。此可称被农民军拘管并献清廷说。

六、若干史籍记载，山海关石河之战刚结束，李自成就遣使同吴三桂议和，吴三桂提出归还太子、二王，迅速撤离京城等条件。李自成应允，将太子送至吴三桂军前。在当时，“太子为吴军夺归”的消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是吴军夺回拥立说。

七、多种史籍记太子一时未能从农民军逃离，李自成仓皇西撤，“二王至陕中尚无恙，吾乡人有亲见之者”。前述农民军拘管并献清廷说曾提到农民军挟太子奔潼关，则以为太子也现身陕西。这可名为山陕露面说。

八、天宁寺僧原明太监某称：“先太子被胁东出师，劳惫，薨于三河。”这是东征劳惫致死说。

九、1644年5月，南明王朝在南京成立。6、7月份，南明官员依据从京师带到江南的消息上奏说：太子卒于乱军之中，永、定二王也遇害。这是死于乱军说。

十、崇祯十七年十二月（1645年初），明廷官员陈洪范被清廷释放南归，召对时奏称：李自成退出北京前，将太子与二王杀害。这是农民军杀害说。

十一、当时在江南流传的，并非都是太子、二王的死讯。崇祯十七年八月，南明官员出使清廷，祭告崇祯帝后，访问东宫、二王消息，据说“东宫、二王流落民间”。这可称为流落民间说，与养于民家等说相近。

十二、《亡明太子朱慈烺隐居栾川前后》一文中称：“明朝灭亡后，太子与二皇子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三人随掌印太监王承恩（化名王冲如）来到栾川”，隐居伏牛山主峰老君山下三十余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去世。栾川当时为河南卢氏一镇（今改为县），比较偏僻，利于藏匿。此说以传说王冲如《重修伏魔宫并香火祀田记》等四文及遗物为据，先前已在李肖胜等《崇祯太子的下落何在》文中介绍过。徐宣武《明崇祯太子——朱慈烺》持论同此，态度很谨慎。认为有关太子和王冲如等藏匿栾川的问题，绝非一二短文所能完全澄清，“更需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及其他有关史料的钩沉抉微做进一步探讨”。此说刊出前数

年,朱纪敦《关于崇祯太子朱慈烺的下落》一文中,已持隐居深山说,但地点在广东程乡。文章认为李自成通过战败议和送交吴三桂的太子,很可能是一赝鼎。真太子由东宫讲读官、翰林院编修李士淳陪同,在李自成西奔后才逃跑,回到李士淳家乡程乡(今梅县)。后来,太子在阴那山灵光寺出家,复明没有希望,就老死深山了。还有一说:“烈皇太子寇乱后流落衡山为僧,吴三桂反时亦不敢出。”三桂死,湖南平定,此僧被迫进京。保和殿大学士李蔚力主杀害,“疏凡七上,竟戮于菜市口”。这位太子和尚的故事残缺而无佐证,最重要的是他怎么到的衡山,有何关系人,丝毫没有说明,结局悲惨,但潜藏深山、落发为僧两点,与他种传说并无二致。这些传说总括为潜隐深山说。

十三、中国台湾徐尧辉医师著《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以南太子为真作前提,认为太子从中国澳门出发抵日本,落户名古屋。这是亡命日本说。

1. 北太子案

白新良等认为,李自成人京后,崇祯太子朱慈烺逃亡在外。半年多以后,在清政权招徕、恩养明朝宗室政策的影响下,太子复出。当年(1644年)十一月底,潜至其外祖嘉定伯周奎家,与其妹长公主相见,“相抱而哭”。两天之后,周奎惧祸连及己,遂将太子出首。得知此事,清政权“即日廷勘”,且召“旧统衣曾侍太子者十人质之”。“十人一见齐跪曰,此真太子”。太子之真已无可置疑。如果按照清朝一再宣布的明朝宗室政策,必应从优加以恩养,但是由于清兵入关不过半年,根基并不牢固,如果承认太子为真并加以恩养,必然会对广大汉族官民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会在清朝政权之外形成另外一个中心,从而构成对清政权的严重威胁。出于这种考虑,清朝以假乱真,使人冒充在李自成进京时早已自杀的崇祯帝贵妃袁氏前去辨认太子真伪,假袁妃辨认真太子,太子自然会由真变假。清政权的这种卑劣手法引起了广大官民的公愤,刑部主事钱凤览、河南道御史赵开心等先后上疏抗争,这时,清朝统治者恼羞成怒,将太子及挽救太子之官员悉数下狱处死,方将这一事件强压下去。^①

2. 南太子案

1644年12月,南明官员发现一位少年,名叫王之明。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抵南京后,官员难辨真假,密报朝廷。南明弘光帝令从官一同审视。大学士王铎等多位曾经见过太子的官员认为是奸人假冒。在抗清前线的官员史可法也怀疑这是伪太子,并上书揭发。

^① 白新良,赵秉忠. 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54.

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大多认为这个少年是假太子,异议不大。但对南明弘光帝继统不满的人认为,弘光皇帝不想归还皇位,所以才坚持说“南太子”为假,并藉此事散布流言,引起了一片混乱。手握重兵的大将黄得功和左良玉都上书表示对弘光政权严刑审讯“南太子”的行为表示不满。左良玉部大军东下,前来挽救太子,对晚明政局产生重大影响。这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方告平息。

关于太子朱慈烺的真伪,学术界一般主张北太子为真,南太子为伪。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力主之,何修龄、白新良等赞成并加以补证。^①

3. 栾川老君山说的可能性

李肖胜、高天山的文章《崇祯太子的下落何在?》(四川《文史杂志》1988年第1期)认为,太子“遁居伏牛山区,偷偷地做了三十多年的亡明皇帝,最后终于复国无望,郁死栾川深山”。作者还仔细勾勒了李自成大顺军溃退的路线图,说明崇祯太子隐退栾川的时间及可能性。

“我们大致可以得知,慈烺太子的出逃当发生在大顺军败退途中。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李自成西撤和南下的路线:自崇祯十七年四月大顺军退出北京后,因后有追兵,沿途各地大顺地方政权倒戈,迫使李自成一退再退,虽经定州、真定阻击战,仍不能扭转局势。同年十二月,多铎率清兵由孟津渡黄河抵河南,旧明山西总兵许定国和豫西土寇李际遇相继降清,使得大顺军在河南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是月二十五日,农民军退到河南陕州,被清兵败于灵宝县。同年年底至次年年年初,双方大战潼关,大顺军败退西安。顺治二年正月十三日,自成军又很快放弃西安,走蓝田,出武关,从商州入河南,再由内乡、邓州一带转入襄阳。当大顺军在正月二十九日至内乡时,滞兵到二月二十九日,以待在陕北的李过、高一功部,直到阿济格率清兵尾随而至,方才拔营南下湖北。

从大顺军自北京败退到湖北沿途形势看,清兵紧追,地主武装纷纷反叛,自成连吃败仗,一直处于军事上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大顺政权后期的内部分化,领导之间、领导与士兵之间协调不够,士气不盛。在李自成集中精力以应付军事内政大事时,被扶持的太子,完全有乘机逃离大顺军的可能。从农民军败退的路线分析,明太子与永、定二王等有无数次逃跑机会,其中逃到豫西伏牛山区的最佳机会即有两次:一次是顺治元年年底的陕州、灵宝之战;另一次是次年正月月底和二月初的内乡歇兵和邓州之战。从政区所辖看,包括今天栾川县在内的

^① 何修龄.太子慈烺和北南两太子案——纪念孟森先生诞生140周年、逝世70周年——太子慈烺和北南两太子案——纪念孟森先生诞生140周年、逝世70周年.中国史研究,2008(2):135.

原卢氏县和灵宝县同属陕州，又互为邻居；从距离远近看，两县同属豫西山地，自陕州、灵宝南下卢氏，可进入居于深山区的卢氏所属之栾川。据此，明太子及永、定二王和随从在双方交战的混乱时刻或大顺军败退关中平原之际便有了出逃的机会，完全有可能在有关人员保护下遁入深山老林，逃到伏牛山主峰老君山脚下。从内乡与栾川的距离分析，两地相差百余里，出逃更方便。尤其是内乡的长期停留，太子等借机逃到丛林密布的伏牛山中任何一个角落，都会令追查者瞠目止步。而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大顺政权的宰相牛金星、吏部尚书宋企郊等等皆乘机逃跑。在大顺军节节失利，并且接连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如此居高显位的大顺官员尚且要离革命队伍，何况一个被农民军夺去社稷而裹挟出走的明太子呢！从陕南、豫西自然条件分析，明末清初，那里的崇山峻岭系被丛林覆盖，交通极不便利，李自成南下时尚有十几万人马，不可能走同一路线撤退，而‘分道而遁’的记载也证明了落后的交通条件委实不利于李自成的大部队共同南下。自陕西的蓝田、洛南，河南的灵宝一带指向东南的襄阳、武昌，必须经过豫西的卢氏、栾川、西峡、内乡、南阳、邓州一带。在这么长的路线和广阔复杂的地域内，大顺稍有松懈，致使慈烺太子得以逃跑不是没有可能。另外，当初李自成进占北京时对慈烺太子等明室后裔的安抚（封太子为宋王，永、定二王亦各封有王号），其初衷也是为招徕明遗臣故吏。而李自成四月十三日将慈烺等挟往山海关，亦是为了堵塞吴三桂效忠故主、拥君复国的口实。现在，当原已臣服大顺的明王室官僚与地主武装沆瀣一气、大举反叛之际，慈烺太子作为李自成的政治筹码便已失去了意义，他实际上已日益成为李自成长途辗转的包袱。因而，他突然消逝于南下途中，这对自成实已是无足轻重的事。”

其后，栾川县志办李玉瑞对上述文章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加以辩护与补充。给出的总结论是：其一，明太子一直跟随李自成农民军后撤，有机会进入栾川。明太子入栾川的时间当在1644年冬或1645年春夏。李自成农民军自北京西撤，途经西安、商南、洛南、灵宝、卢氏，向襄阳转移，造成了太子脱离大顺军并向栾川逃遁的良机。其二，栾川有银矿，因而明王朝对栾川并不陌生。明朝皇室派太监长期驻栾川经营银矿，熟悉栾川地理民情。此外，明皇室又笃信道教，向往道教圣地老君山，因此明太子逃至栾川，绝非偶然。^①

4. 明太子在栾川的遗迹及其佐证

按照栾川当地的传说，明太子17岁来到栾川，在栾川生活了34年，51岁去世。主要佐证如下：

^① 栾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栾川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736-737.

其一,当地口头传说的地名痕迹。最重要的就是“太子遗冢”,俗称“太子坟”^①。在当时老百姓有口传,如太子坟、王承恩墓、贾上还墓。这是比较强的佐证。

其二,在清朝初年的栾川,有一位怪人,他公开使用的名字是“王冲如”。关于王冲如,《卢氏县志·庙宇》有传:“王冲如,居十方院,学问渊博,笔意疏古。所撰《降魔宫》(指《重修伏魔宫并香火祀田记》)碑文及自作《墓志》与绝命诗,语多奥衍,迥异时下,恒蹊疑与贾尚桓(上还)同时明季隐君子。”

王冲如撰写了四块碑文:《重修伏魔宫并香火祀田记》《仙坟记》《祭鬼王文》《王冲如墓志》。李玉瑞认为,以上碑文均由王冲如撰写,约撰写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之间,前后相隔50年。^②

这些碑文中有不同隐晦的词句,有人将其解释为与崇祯太子相关。碑文中揭示了墓主人特殊身份的信息。

例1:“万仞宫墙”。

如《祭鬼王文》:“万仞宫墙,有门难进;百年寿算,无计可留。”当地学者将其解释成指北京皇宫依旧存在,但是被高大的宫墙阻隔,因而“有门难进”。认为这是描述崇祯太子感叹自己无法再次回到明朝的紫禁城、不能光复社稷的悲惨命运。

例2:“冥宸”。

《仙坟记》云:“住世者奉祭扫于冥宸。”“宸”一般是皇帝专用的词,“冥宸”,即埋在九泉下的皇帝,指崇祯皇帝。李玉瑞认为:这些材料表明,“在关键处,作者不惜冒杀头的危险,遣词准确,隐中有显,毫不含糊地向后人交代太子的身份。”“这些碑文正是太子生前匿于栾川偷偷做亡明皇帝,死后葬于老君山下的铁证。”

例3:“不封不树”。

《仙坟记》:“不封不树,似缺方内之典,恐子贡见责。”不封不树指薄葬,字面意是既没有封土堆,也不种植树木作为标识。“方内”指现实世界。子贡特别重视孔子的葬仪,为孔子守六年之丧。这段在原碑文中放在例2(冥宸)之前。当地学者将这段话解释成,明遗民要按皇帝葬仪埋葬太子,不能等同于老庄的薄

^① 参见本书上编第二章“殿堂志”部分,摘自《栾川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太子遗冢”词条。

^② 已故栾川县地方学者李玉瑞是崇祯太子隐居栾川县老君山附近的坚定支持者,著有《碑文要点析释》,收入四篇碑文,并从地方文化视角详细加以注释和引申。同时,李玉瑞本人还有《致信姚雪垠——探讨王冲如“四篇碑文”》的信函,简要概括了观点与论据。以上材料均见:栾川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栾川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725-734。本书所引相关材料,大体出自三联书店版《栾川县志》,特此说明。

葬。要遵奉儒教礼仪埋葬太子，以便“住世者奉祭扫于冥宸”，而且要封丘栽树，建造陵墓，让活着的遗民臣属祭扫九泉下的皇帝。并进而推论，该文这是把太子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世。

例 4：“弃其怪诞之学”一解。

碑文写道：“弃其怪诞之学，克遵先王之训者，即是此地之灵气。”有学者作如下解释：“怪诞之学”是道教之学，“先王”指崇祯帝，“先王之训”是崇祯皇帝的遗训。“弃”表明并不是真的出家做道士，而是经常放弃道教，转而遵奉儒家君臣伦理。有学者将上述描述解释成太子暗中做亡明皇帝。以此证明太子出家修仙是假，矢志不移奉行先王之训是真。李玉瑞先生曾经研究过崇祯皇帝在殉国前对太子委以国事重托的历史记载。依照此说，崇祯皇帝曾诏告天下：“国家重务，悉委太子。”从而如今虽然社稷易手，明朝江山破碎，但是太子作为一代储君，不甘于沦为臣民，于是遵先王遗训，在遗民贵族中称孤道寡于老君山下，坚持“天伦之大，圣教之尊，父子不可懈于心，君臣无所逃于天地”的伦理宗法制度。遗民贵族也毫不越规乱伦，仍然恪守君臣之礼。这个俨若礼仪之邦的小天地，即是老君山的“灵气”。据有人说，随从们就齐集朝阳宫朝觐太子。关于朝拜的时间，有人说在逢三、六、九日，有人说在夜里。

例 5：随太子前来栾川的不是普通道士，而是一批腰缠万贯的流亡贵族。

《祀田记》碑文有一段话：“所遗夫子之庙，惟存荒址而已矣。清鼎甫定，羽客来居。黄冠刘太秀、顾阳凤，先罄囊余之有，后为同人者倡，是以整圣容，鈇金青，饰丹堊，扩彤墀，修废举坠，革故鼎新，仰瞻天表，恍灵籟之振丹青；回顾尊亲，疑神飙之出银汉。然则过斯庭者，则无不敬，悉敬于由衷而思无邪矣；登斯台者，则钦厥止，皆止于至善而恒其德矣。心正德恒，而民之不治者未之有也。虑香灯之所费，司事之所需，乃蒙本县正堂老爷胡度量宫观之宽隘，检点主持之多少，清查无碍。抛荒滩，开祀田，兼免差赋，使黄冠等邀食于地，奉事于天。俾君山之灵气，帝祠之神武，振纲常，裨治道，靡风化，正人心，戡穀遗徽于厥后，而舍乎名言之所未尽者也。”这篇碑记记述了整修道观的过程，以及道观的经费来源祀田的相当事宜。当地学者是这样解释的：这批人决非真正的云游“羽客”（道士），而是腰缠万贯的流亡贵族。他们解囊修庙，垦种祀田。太子等初来栾川，住于关帝庙内，但是“庙宇失修，惟存荒址而已矣”！因此逃亡贵族们不惜大修庙宇来解决居住问题。这说明追随太子的遗民贵族相当多，因此单靠原有祀田难以维持膳食。他们必须垦荒，新开祀田，才能满足生活需求。

例 6：“余之辞世，实非作俑”解。

有当地学者相信，王冲如就是太监王承恩。在正史中，太监王承恩随崇祯

皇帝一同自尽于煤山。史学界并无争议。有当地学者相信，王承恩没有死。崇祯皇帝自杀前，将太子托付给了王承恩，以期延续明王朝的生命。煤山上自尽的是王承恩的替身。

具体的佐证则是上述碑刻。不知从何时起，老君山下百姓将其称作“王承恩”。王冲如即王承恩。王冲如在自撰的《王冲如墓志》自白：“余之辞世，实非作俑，非得易也，乞高明者谅之。”这句话的涵义并不清晰。当地学者将这段话解释成王承恩没有自尽。有学者认为：“传说与王冲如自白相互印证，信而有征，足以证实王冲如是王承恩的化名。再从甲申之变时崇祯帝托辅东官的情况看，王承恩受托的可能性很大。若果然如此，王承恩就必定不会自缢帝侧，他辅太子来栾川是完全可能的。”

这段论述中推理链条很长，推论过度，缺乏坚固事实作为基础。

例 7：碑文有强烈的政治关怀，这在碑文中不太常见。

《祀田记》：“明季来，书契渐替，九伐失伍；天现蚩尤之旗，地飞旱魃之灵。兵呼庚癸之不至者，半走绿林；民苦菜谷之不熟者，悉归乌党。以致白骨飞灰，孤魂吊月，即存一二孑遗，悉保残息于他方。”“心正德恒，而民之不治者未之有也。……俾君山之灵气，帝祠之神武，振纲常，裨治道，靡风化，正人心。”《仙坟记》：“壺中之文人不见，鄂渚之帝史难逢。……后起之士，当知生死之真，是非之正，天伦之大，圣教之尊，父子不可懈于心，君臣无所逃于天地。弃其怪诞之学，克遵先王之训者，即是此地之灵气，化形生之征验也。”《祭鬼王文》：“年月日时之大造，运限鼎革；祖宗父母之天伦，骨肉睽离。”

例 8：王冲如与贾上还。

《仙坟记》列举一个捐款名单，其中就有“王冲如”与“贾上还”。

除碑文外，还有各种遗址遗物作为辅证。主要如下：

墓址：在栾川城东 3 公里伊河北岸百炉沟口的丘陵上有太子慈娘墓。丘陵下有仙坟墓园，是追随太子的遗民们的公墓，太子死后曾厝葬在这里。在伊河岸老君山下，有太子的亲密追随者王冲如墓和贾上还墓。这些墓葬除仙坟墓园外，其他各墓于 1934 年被地霸董其功窃掘，墓葬文物被盗窃一空。

宫殿遗址：太子逃来栾川，伪装黄冠道士，图谋反清复明，在老君山下建造两处宫殿，一处是在伊河南岸，名太子宫，为太子居住的宫殿；一处位于伊河北岸，名朝王宫，为朝觐议事宫殿。为了避嫌，对外太子宫称太清宫，在明代是关帝庙，位于魁丘山，即今龙泉山公园附近，又叫“伏魔宫”，原址位于老栾川一中。朝王宫又称朝阳宫。据说，所建两处宫殿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时仍然完整无损。50 年代以后被破坏，今尚存部分残破建筑物。

玉带：太子墓殉葬品，当地土匪董其功窃墓时，由窃墓者解析分赃。时每节



王冲如墓地

玉带片售价银币 3 元。多数人见过此物。据老教师李明岳谈，每节玉带片白玉嵌芯，赤金镶边，金边镌龙凤图案。

印玺：从太子墓中窃出，据目睹者老中医徐唐哲谈，铜印，印面约一寸见方，阳文篆字，印文清晰。很多人见过此印，因见者都不识篆字，故不懂印文。

铜锤：从太子墓中窃出，与上述印玺同归国民党某要员收藏。据目睹者徐唐哲谈，锤六方形，长约 20 厘米，直径约 3 厘米，锤把也是铜质，长约 25 厘米。

龙凤剑：太子生前专用剑，长 3 尺许，鞘饰赤金龙凤图案。太子死后，龙凤剑由十方院住持道人珍藏，世代承传。民间有疾病邪祟，请道人持剑禳灾，所以许多农民见过此剑。民国时期被当地张某盗卖，变成暴发户。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斗争张某，追查此剑，因盗卖外地，终无下落。

磨性弹：为木制圆球，直径约 25 厘米，球上置铁鼻，系绳。贾上还生前拖弹磨性，故名“磨性弹”。

清末文人常恺说贾上还还是明末皇室勋戚，归隐于老君山。《卢氏县志·庙宇》有传：“贾尚桓(上还)，不知何许人，明末入卢为道士，住栾川太清宫。尝数日不食。铸磨性弹重一钧，昼拽之行，有所绊，不返顾，非人代为疏通，痴立如泥塑人。夜则撒百钱于室中，摸如数方就枕。一夕，二妹自山东来，相对唏嘘，语言多不可解，越宿即去。后闻烈皇殉国难，披发跣足，号泣三日，死。”

据民间传说，贾上还性格怪异，脾气暴躁，如疯似癫。为了修炼自己的耐心，贾上还经常拖着一个木球（“磨性弹”），在路上徘徊，“有所绊，不返顾，非人代为疏通，痴立如泥塑人”。当地学者称为“拖弹磨性”。由于心思太重，夜晚失眠，于是“夜则撒百钱于室中，摸如数方就枕”。无论是拖弹磨性，还是夜晚摸钱，均是消磨急躁秉性的修养方法。铜钱被摸得锃亮发光，“磨性弹”逐渐磨损由大变小。贾尚桓对明太子的死亡极感悲痛，披发跣足，终日号泣而亡。清代

常愷写诗赞叹他：“伤心故国时披发，炼性空堂夜摸钱。痛哭烈皇肠欲断，至今遥忆倍凄然。”

依据栾川当地有关人士的说法，明太子来栾川，首先来到老君山，在龙君河一带。老君山管委会 2000 年以后将龙君河改名为追梦谷。这个梦主要就是指明太子复兴明王朝的梦想。栾川景区管委会的冯进宝参与了追梦谷的再命名过程，他对追梦谷有如下描述：“明朝末年，又一位被历史争论不休，最后不知所终的人物，他就是明太子朱慈烺，隐姓埋名，到老君山下避难，以黄冠道人自居，隐居三十五年，随从太监王承恩不负托孤之重，为慈烺修建太清宫，故事流传至今。”^①

依据上述事实 and 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这些材料的确有些神秘的信息，“万仞宫墙”“冥宸”确与皇城有关联。但这些提示并不能够表明，墓的主人就是太子。如果理解成是前明在宫墙中做官做事的人，也是成立的。因此，“铁证”一词，显得有些夸大其词。

李玉瑞先生等当地学者对四篇碑文的深度分析，结合当地的相关传说，可以为“崇祯太子逃遁老君山”的传说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但这样的证据支持并不足以为全国学界接受。首先，碑文内容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关于崇祯太子的明确记载，李先生对于碑文的分析基本上只是推测。比如，“白骨飞灭，孤魂吊月”虽然可能指甲申之变，但是也可能指其他的惨剧；再如，“即存一二孑遗，悉保残息于他方”指的也未必就是明皇室的惨状。除此之外，四篇碑文的相关传说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当它与正史冲突之时。众所周知，民间传说的真实性并不强，因此根据民间传说来肯定一个历史结论是不科学的。以王冲如事为例，民间传说认为王冲如就是王承恩，但是传说终究只是传说，在没有其他可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墓志》未明确说明作者身份，因此不可作为直接证据），传说是不足为信的。更何况关于王冲如的传说与《明史》相关记载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传说的可靠性就更加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虽然当地为“崇祯太子逃遁老君山”的传说提供了一些实物证据和传说证据，但是因为实物证据或已流失，或未能提供明确证明，而传说证据的可靠性又没有保障，所以我们认为，该传说只能停留于传说层面，不能成为信史。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只是传说，但是该传说及相关证据对于当地而言依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该传说增强了当地的文化底蕴，增强了当地文化的叙事性，增强了当地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其次，该传说及相关证据也对

^① 冯进宝. 老君山之韵.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11.

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四篇碑文曾经广为当地学生所传抄,在传抄过程中学生们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提高。最后,传说的存在提供了地方文化研究的对象,为了说服学界,当地学者不断搜寻新的理据,进行论辩,这也提高了当地文化的水平,这也是必须看到的事实。地方性传说是中华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清代至民国老君山的逐渐没落和再次兴起

清代统治者系关外满洲贵族,对道教素无信仰,所以清代对道教基本上是采取限制政策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道教圣地的老君山也自然面临着没落的悲惨命运。

清王朝垮台后,清代对于道教的限制一去不返,老君山也因此得以在民国时期再次兴起。在民国时期,每年从农历三月起,就有大量游人、香客朝山观光。农历四月初八为老君山盛大香火庙会,山西、陕西、许昌、南阳和豫西各地的善男信女、黄童白叟,纷纷前来顶礼朝圣,不绝于途,年数以万计。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老君山简史

有些历史文物古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由文物部门管理。老君山则与之不同,它是自然生长的道教遗迹。新中国成立后,老君山的道教文化发展可以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85年老君山成为旅游景点;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2007年;第三阶段,从2007年到现在,老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始主导老君山的旅游开发。这三个阶段各有特点。第一阶段可概括为“文物阶段”,第二阶段为“文物旅游阶段”,第三阶段可概括为“道家道教文化景区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85年)

总体上看,栾川属于豫西地区,老君山所在的栾川镇,旧隶陕州卢氏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豫西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1947年栾川解放,再置县,先后隶属豫鄂陕边区四专区、豫陕鄂边区三专区、陕南一专区、豫西七专区、陕州专区和洛阳专区。频繁调整的背后,反映了整个豫西地区社会经济格局的复杂性直到新中国成立初仍在摸索治理之道。今天的栾川县,在历史上并不是独立的县级行政区域。它是由邻近的卢氏县、嵩县等重新组成的县级实体。豫西地区社会经济格局的复杂性是当地道教文化生存的社会基础,只有道教文化能够较好地为老百姓的人生答疑释惑。

在这一阶段,老君崇拜趋于衰落,不过当地老百姓个人的祭拜活动则从未绝迹。老君庙的铜像铁像等成为文物,受到法律保护。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一位胆大妄为的不法之徒,将鸿钧老祖的铜像砸碎,当作废铜卖钱,被政府判了刑。我们在采访时,当地人更津津乐道地谈论这个人后来遭到的报应。

老君庙的日常管理则交付国营林场。1956年,栾川县老君山林场成立,由原老君山、伊源两个森林经营所合并而成,隶属栾川县政府管理,从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老君山归属国营林场管辖,国营林场是一林业单位,关注于森林防火、培育林木,销售木材等任务。职工有几十人。林场对老君崇拜没有兴趣,仅仅将其看成是一个文物旧迹。作为国营单位,林场对文物局的规定基本上照章执行。

在这个阶段,当地老百姓自发的或个人的小规模祭拜还依然存在。尽管在当时这些崇拜都看成是迷信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君山也遭到破坏,许多珍贵铁像被摔碎。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2007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营林场面临改革压力,开始认识到老君庙的文物价值,将老君山变成文物公园,并逐步进行了旅游景点建设,积累了一定的发展经验。

老君山的景点建设,并不是旅游局与文化局主动设计的产物,而是由林场改革倒逼出来的。因此有必要首先清理这段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营林场改革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林场改革第一阶段: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国营林场的办场方针是“以林为主,多种经营”。景区建设是多种经营的一部分,是辅助性成分。由于当时处于物资短缺时期,国营林场通过开展多种经营生产的各类初级产品,市场畅销,经济效益较好,收入显著增加。

1982年,老君山被确定为国家自然保护区,拥有国营林场和伏牛山自然保护区双重身份。1985年,栾川县人民政府将老君山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君山开始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出售门票。门票收入较少,林场森林防火、培育林木的经费和职工工资主要依靠省政府拨款。1987年至1989年民众自发捐资,将老君山庙宇重修,旅游门票价格有所上升,但总数仍然非常有限。1994年,老君山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在这个阶段,人们上山,主要是看山踏青,顺便看看老君庙。

林场改革第二阶段: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早期改革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市场上产品不再短缺,林场产品的竞争力不

够,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经济效益下滑,林场经济危困局面开始显现,陷入行业亏损。这种亏损不只有老君山一家,它是全国性的。90年代中期,全国国营林场出现全面亏损。

林场改革第三阶段: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具体说是1997年)至今。在这个阶段,改革压力更大。国营林场生存危机还没摆脱,又出现更沉重的使命。国家对林业方针进行了根本性调整,林业要转向以生态保护为主。1997年老君山林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实行木材禁伐,林场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

林业工作的重点从木材生产转向生态保护,林场只能通过国家拨款维持日常运营。国营林场原先就不能很好地应对纯市场的竞争,现在则连竞争的本钱都要失去,其面临的困难,引起了政府的广泛关注。为此,中央财政从1997年开始安排国营林场扶贫专项资金,帮助国营林场解决生存危机。

栾川县属于山区,农业原本不发达,工业以矿业,尤其以有色金属钼矿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县委、县政府将旅游业作为重要产业加以扶持。除老君山以外,栾川县的著名旅游景点有鸡冠洞、龙浴湾和重渡沟等。这些景区都以山水著名。2004年,因为鸡冠洞、龙浴湾和重渡沟等旅游景观群的成功打造,栾川的旅游发展在全国也很有影响,被称为“栾川模式”,具体内容四条:党政主导、部门联动、全民参与和注重营销。^①2007年,栾川县旅游业发展已成规模且势头强劲。年末,栾川县被评为中国旅游强县。这一年全县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1%和16.7%。全县生产总值67亿元,人均GDP突破2.7万元。^②

2000年8月,栾川县委、县政府制订全县旅游规划时,把老君山确定为栾川县旅游的龙头景区。2003年,当时的景区管理者林场还争取得到国家以工代赈扶贫资金2000万元投入林场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盘山公路和广场。这条盘山公路至今仍在使用。最早依靠这条公路往山上运载旅客。

栾川模式蜚声全国,影响较大,但老君山景区在这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起色。作为旅游强县,老君山也尽心尽力,譬如说,在此期间,老君山管理层经常到各省开办旅游推介会,旅游产业也在发展,但成绩不够显著。原因何在?应当归结为老君山旅游资源的特殊性。老君山是一个自然人文交汇的综合型景区,不同于单纯的自然风景区。

单纯看自然风景,或是单纯看人文景观,老君山在河南省并不占明显优势。

① 邵春. 栾川模式考. 中国旅游报, 2004-10-29.

② 河南省栾川县旅游工作委员会主任杨保春关于2008年栾川模式的讲话。

老君山的优势在于其综合性。老君山有知识价值,譬如说有地质公园,但山多水少。老君山是伏牛山主峰,是当地最高点,但没有高空栈道,空有众多美景,无法让游人轻松观看。再譬如说,老君山有老君庙,内有古代铁神像,在栾川县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对学者很有吸引力。但铁神像在观感上并不能激发普通游客的热情。道教庙宇,山下的“灵官殿”略有可看,也不过一座普通神庙。^①山上的淋醋殿、救苦殿均简陋不堪,无法吸引游人。

如何建设自然与文化交错的综合性景区?栾川并没有现成经验。粗略讲,它需要三方面资源。一是理念,认识到老君山的文化价值。这就要有文化自觉,认识到老君山上的道教文化本身就有价值。二是工作团队,有一批愿意为此理念付出而且充满热情的骨干。三是有资金投入。

这中间最难的是理念。欣赏自然山水之美,社会各界均无异议。欣赏文化传统之价值,社会各界未必能形成统一共识。元宵看龙灯、端午赛龙舟之类,满足老百姓的赏游之乐,社会各界易于达成共识。涉及人文传统,尤其是道释,就未必都有共识。大约是2014年,栾川县城的大街上,宣传老君山旅游的宣传牌上仍然写着“山岳经典,十里画屏”。经过询问,这是省里主管旅游的领导为老君山定的调子。“十里画屏”是老君山的地质景观,旧称石林,是一花岗岩体,被国内地质专家命名为“老君山岩体”。领导题词隐含的希望是:老君山要以自然景观为中心,不要过多触碰道家道教文化,如果对道家道教有兴趣,最好不要超出文物的范畴。因此,老君山文化资源的潜力,一是取决于建设方的挖掘,它还取决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包容。2000年以来,我国各界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增强,相关政策规定也在不断微调,以求更好地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但这一过程必然是谨慎缓慢的。因此,要能够认识到,不仅仅是山上的少数铁神像具有文物价值,而是整个老君山的道家道教文化本身具有价值,否则老君山景区的建设前景是非常有限的。

人才与资金都很重要,也很匮乏。林场是国家企业,自身生存就有困难,难于做出大手笔的前瞻性的开发。在这个阶段,老君山方面无论是对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对外旅游宣传资金都极其匮乏,旅游市场并没有得到极大拓展,景区收入没有很大增长。除了林场的日常开支以外,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一部

^① 灵官殿不知始于何时,早已不存。民国年间曾经重修。1993年建设了一座“灵官殿”,够不上文物标准。2007年在附近又重建了高大雄伟的灵官殿(这就是现在看到的灵官殿),成为老君山一景。此后,“灵官殿”(1993年建)荒弃,2014年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三官殿”(2015年建成)。老君山地区的道教,其主神通常是三清中的太上老君,但必定有送子娘娘(一般是三霄娘娘)、药王孙思邈陪祀。灵官殿旁边还有一座奶奶殿(应当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晚于“老灵官殿”),内供有三霄娘娘、药王孙思邈。殿中有一老君骑牛的涂漆泥塑像,比三霄娘娘泥塑像更显老旧,确切年代暂不可考。

分是来源于贷款。截至 2007 年,老君山景区旅游收入大概在 30 万元,债务却高达 830 多万元。

县委、县政府为加快发展旅游业,也尽力为老君山招商引资。为充分发挥老君山的文化潜力,景区聘请相关设计院做了规划,其中有些设想也非常好,例如建议修建巨大体量的老子像作为景区标志、建立道德经墙等。但企业家们根据规划进行了经济核算,得出的结论却比较一致,即老君山景区建设是一个长线项目,从长远看有前景,短期内投入与产出很不平衡。再考虑到各种政策风险与经营风险,外地企业家没有强烈的投资意愿。

县委、县政府认识到,对于必须长期持有才有可能盈利的项目,既然外地企业家投资意愿不足,应当寻找与本地企业家,因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子孙后代有可能与栾川发展命运与共,只有他们有可能愿意接受长期持有的风险与代价。县政府转向本地民营企业,鼓励他们投资老君山旅游。2007 年 8 月份,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下,本地民营企业杨植森决定投资老君山旅游开发。杨植森原先以开发钼矿资源起家,接受这个项目之后,立即成立老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国有股份占 20%,民营股份占 80%,转让期限为 70 年。

杨植森务过农,采过钼矿,在新形势下,转到旅游文化产业,老君山附近七里坪村土生土长的村支书杨植森开启了一场充满风险的事业转型之旅。

公司成立以后,首先还清了原来林场的债务,同时接收原来林场中十几个工作人员在公司工作,工资和福利待遇一应由公司提供,减轻林场的就业负担。自 2008 年开始,公司大刀阔斧,通过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让昔日的老君山焕然一新。公司重新聘请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老君山风景区制订新的规划,公司开始对各种设施进行投资。投资顺序如下:①老子文化苑;②灵官殿;③索道;④栈道;⑤庙宇;⑥收购寨沟;⑦游客中心。

截至目前,在政府旅游部门大力营销的支持下,老君山旅游景区发展迅速。旅游收入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2014 年,全国多数景区发展速度放缓,老君山的发展态势依然不错。

从文化角度来看,老君山近年的成功得益于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并重的发展策略:挖掘并弘扬道教文化,包括山顶道教神仙文化,追梦谷道教修行文化和寨沟道教养生文化,通过多方位增强老君山的道教文化底蕴,打造独一无二的旅游品牌。在管理层方面,杨植森从最初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渐形成文化自觉,并在管理层之中达成了共识:老君山最大的优势是其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兼备。老君山拥有优质的自然资源,享有世界地质公园和伏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诸多美誉,但与河南省其他著名的自然景观相比,并没有很明显的优势。道家道教文化才是老君山区别于其他自然风景区的关键。思路清楚之后,就是

坚决地落实。景区不惜重金建设了一系列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以金顶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建筑,增强了道教文化的吸引力。其次,老子像、道德经墙、灵官殿和金顶等诸多饱含道教文化元素的建筑已经落成,汪国真、余光中等诸多文艺界学者名人前来题诗留言,游客可以从这些文物建筑中领略博大精深的道家文化。最后,老君山通过道教音乐、道家养生饮食、老子论坛和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要“为当今茫然的人寻根,为精神空虚的人提供一场盛宴,为劳神劳心的人留出一方净土”。

老君山景区目前依然处于前期投资阶段,从长远来看,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可观的。现在已经显现的是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公司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并没有放松环境保护。从地区规划来看,老君山景区被划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分级保护区,景区分别通过禁止游客进入、控制游客数量、适度安排旅游服务设施和适度开发等保护措施对旅游资源进行保护。从开放时间来看,在11月到次年1月份期间,为了达到护林防火的目的,景区原则上不接待游客。旅游业的兴起使原来的国营林场找到了新的发展道路,除此之外,它还造福一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栾川县是典型的深山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收入较低。伴随着老君山旅游业的发展,景区间接带动近200个家庭宾馆经营,解决了1000多人就业。^① 周边七里坪、寨沟和方村等村庄村民通过提供餐饮、住宿以及销售香菇、木耳和野果等土特产品等旅游服务实现了脱贫致富。此外,老君山庙宇的香客捐赠收入除了用以庙宇维修和庙管人员的日常支出以外,还用来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如资助贫困大学生求学等。

老君山未来的发展是要打造“一轴两翼”的发展格局,“一轴”是指老君山主题景区,“两翼”分别指追梦谷和寨沟。就老君山主题景区而言,要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增修索道,建立完善的游客中心等;同时形成老子文化苑、中天门、舍身崖、洞天府地、十里画屏和金顶集聚区六大观光游览片区,不断举办老子学术论坛、摄影大赛等文化活动,融老子文化于秀美山光之中。就追梦谷而言,一方面,完善道路建设和游览设施,建立更多的家庭宾馆,增强景区接待能力;另一方面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开展多样化的文艺演出活动。因为寨沟地势比较平缓,适宜建筑的地区广阔,规划建立星级酒店等,力图将其打造为一个休闲度假胜地。

老君山的发展引领了栾川县第二次旅游发展浪潮。2012年,接待游客从2002年的20万人次升高到78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从2000年不足5000万

^① 参见《融合发展:发挥组合的力量——河南省栾川县旅游转型提升之路报道之二》,2012年。